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4 期
第 114 ~ 123 页

中国先哲契合唯物史观基本前提的睿智思想*

孙寿涛　周德丰**

【摘　要】在中国历代先哲创造并积累的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中，蕴含丰富的契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前提的睿智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存在及其作用两个方面的创见：一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视，这既包括中国古代悠久的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也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问题和义—利关系问题上的深刻探讨；二是涌现谭峭“唯食史观”和孙中山“民生史观”这样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后者更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传统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就。这些内容构成今天仍值得我们珍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史观基因”。

【关键词】唯物史观基因；义—利；唯食史观；民生史观

在创建并确认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史观的同时，恩格斯曾强调“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① 列宁也说过“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② 他们强调的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只要承认这一基本前提，就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在这方面，中国历代先哲有诸多契合这一基本前提的睿智思想，如悠久的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思想传统，并涌现谭峭“唯食史观”和孙中山“民生史观”这样重视经济因素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这些思想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唯物史

---

* 本研究项目受到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支持。

** 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周德丰，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现代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320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 13 页。

观基因的重要内容。①

一　重视社会经济因素的思想传统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在这方面，中国历代先哲形成了悠久的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②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形成重视经济生活的学术传统。《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率先昭示重视经济的思想，司马迁《史记》专列《平准书》《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创《食货志》并为后来许多“正史”效法，杜佑《通典》更置《食货典》于诸典之首等，充分显示这一优良思想传统。

司马迁将《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重视经济思想的做法落实在纪传史领域，撰《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社会经济方面内容，并试图从经济发展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他说：“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

学界对司马迁这方面的理论贡献有着共识。白寿彝指出：“《货殖列传》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这对当时的有神论之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是进行了正面的有力打击；对理论的成就来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我国中世纪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③ 仓修良认为：“司马迁是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力图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

---

① 我们认为，唯物史观是由社会结构论、历史动力论和社会（历史）主体论三方面理论构成的科学体系。我们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动力论和社会主体论方面的唯物史观基因进行了专门梳理，本文属于从社会结构论方面进行的梳理。限于篇幅，仅限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社会存在之经济因素及其作用这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前提方面的探讨。相关前期成果参见孙寿涛、周德丰《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孙寿涛、周德丰《历史动力论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唯物史观基因新探》，《学术交流》2017 年第 12 期；孙寿涛、周德丰《社会主体论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唯物史观基因新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② 限于篇幅，我们萃集古代思想家有关经济因素的研究，他们有关地理和人口因素的探索，另文分析。

③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 730 页。

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① 许殿才强调，司马迁有关经济问题的见解“有接近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色，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特殊的理论价值”。②

班固对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中作用的认识也颇为深刻。《汉书》首创《食货志》，③ 开篇论述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这是国家施政方针的最根本环节：“《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茂迁有无，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汉书·食货志上》）班固强调：“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榷古今，监世盈虚。”（《汉书·传·叙传下》）食货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此见解无疑“是班固史学思想中的卓识”。④

杜佑则明确认识到，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帮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他认识到经济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从衣食为教化之本出发，主张政治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政治制度必须以财政制度为基础。因此，他将《食货》置于《通典》九门之首。食货并列，集中体现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历代史书虽大多有《食货志》，但将其名次排在第一位的则是杜佑首创。

在《食货》门中，又以田制问题最重要：“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国固而不动，则莫不生

①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第81页。
② 许殿才：《中国史学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6页。
③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　历史思维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279页。
④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　历史思维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280页。

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杜佑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放在历代典章制度的首位加以叙述，足见其史家之卓识。① 有学者评价道：“杜佑从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入手，考察政治制度的基础、构成与理念，这一思路与见解无疑包含真知灼见。”② 更有学者强调，杜佑提出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思想家关于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新高度，此后上千年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进展是缓慢的，并始终带有朴素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在这一领域的历史观念才产生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③

二　深刻探索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

中国历代先哲对社会存在之历史作用的研究，体现在他们对经济生活之决定作用的卓越见解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问题和义—利关系问题。

（一）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

中国历代先哲在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问题上，提出和论证了“礼生于有”的道德起源论和“先富后教”的道德教育论。

1. “礼生于有”的道德起源论

在社会经济生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提出过许多精彩命题，他们多数坚持道德观念依附于社会经济生活而存在的主张。如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司马迁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王符提出：“礼义生于富足，盗贼起于贫穷”（王符《潜夫论》，卷五）；杜佑在《通典》开卷中说道：“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这些命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道德面貌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多寡，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稍微有夸大物质生活作用之嫌），但看到道德观念依附于社会经济生活而存在、变化，则是卓越见解。

韩非曾试图用人们的职业分工和利害关系来解释人们的思想动机和道德面貌。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

①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第253页。

② 张分田、张鸿、商爱玲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486页。

③ 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第63页。

子·备内》）他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不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他反对所谓的道德退化的理论，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针对儒、墨两家高调歌颂古人人品高尚，“辞让”而不为己，指责今人处处为己而不“辞让”的说法，他说“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辞让和争夺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人辞让出于必然，今人争夺同样出于必然，何必厚彼薄此！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试图唯物地解释道德的起源，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还有思想家注意到农业生活状况对人们道德面貌的影响。墨翟说“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墨子·七患》）在古代，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因此，年景的丰歉对社会生活、道德风尚有着重大的影响。墨子的见识是可贵的。后来王充提出“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和“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的命题，正是对墨子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明确认识到仁义道德首先为物质条件所支配，而物质条件的占有是人们的普遍愿望。司马迁这一唯物主义论点曾刺痛正宗唯心论者的道德观点而遭到强烈的批驳，如班彪、班固父子先后谴责他“轻仁义而羞贫穷”，乃非圣人之所是。①

2. “先富后教”的道德建设论

在“礼生于有”道德起源论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又提出先进行经济建设再进行道德建设的主张。管子的治国之道就包含这一思想。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其知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更明确提出先富民再教民主张的是孔子。《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之后，孟子又作了发挥，指出“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指实现仁政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制民之产”，使民众有充足的生活资料。对一般民众来说，他们有恒产才有恒心，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6页。

无恒产就没有恒心。因此，为使民众有恒心，就必须先使其有恒产。孟子明确说："是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二）深刻回答义—利关系问题

有学者指出，"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四个主要问题之一。[①] 中国历代先哲对义利关系问题的卓越思想，表现了他们对经济生活决定性作用的深刻理解。自从孟子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非功利主义观点以来，每每为有识之士所非议，他们形成讲究义利统一、重视功利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古代"经世致用"进步学者的共同特点。

司马迁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合理的。他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谋求个人利益，是人的"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主张要先解决衣食问题，打好物质基础，才能谈到所谓礼节。"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这种观点与统治阶级用仁义道德来抹杀人民物质利益的"重义轻利"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北宋李覯颇有战斗性地说道："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直讲李先生文集·原文》）他强调："《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兄弟婚媾，非财不亲"；"凶荒札瘥，非财不恤"。因此，儒者"贵义而贱利"之论完全错误，他断言："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富国策·第一》）

南宋永康、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家对立道德和功利、空谈道德性命的论调，给予有力驳斥，深刻阐释道德和功利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陈亮认为，道德节义不是空洞条文，它要表现为事功，要和事功结合起来，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答陈同甫》）。近世儒者"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结果只会空发议论，而不是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他以极大魄力提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②] 叶适也明确指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不应离功利侈谈道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才称得上"道义光明"。董仲舒等所鼓吹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

① 宋志明、向世陵、姜日天：《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6页。
② 《陈亮集》卷28，附《寄陈同甫书八》。

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宋儒“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习学记言》卷二三）

针对朱熹义利不两立，如“崇利”就是“绌义”的观点，陈亮明确主张义利双行，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讲“理”不能脱离民生日用富国强兵之术。他说“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将一味讲正心诚意不达世务，不知真正的富国强兵之术的理学家，称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犀利痛快。

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目睹道学非功利主义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更加强调道德和功利的统一。黄宗羲说“事功节义，理无二致。”（《明名臣言行录序》）顾炎武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李颙道：“道不虚谈，学贵实效”，“酌古准今以致用”。（《二曲全集》卷七、卷十四）颜元断言：“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以义以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四书正误》卷一）他还理直气壮地质疑道：“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待钩而不计得鱼者乎？”（《习斋言行录》卷八）因此，应把董仲舒那句迂阔的话改作“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

有关道德和功利的关系，毛泽东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① 他批评那些轻视经济工作的同志，正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② 可见，毛泽东摒弃董仲舒等非功利主义的唯心思想，批判继承富有唯物主义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

三　建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中国历代先哲对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视，还表现在涌现谭峭“唯食史观”和孙中山“民生史观”这样较为系统且契合唯物史观基本前提的理论建构。

（一）谭峭的“唯食史观”

谭峭提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的唯“食”史观，强调吃饭是人民最低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65页。

也是首要的要求，表现其同情人民的政治立场。① 他明确说："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化书·七夺》）农民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被王、士、兵、吏、工、商、道释（道士僧侣）等所侵夺！他本人虽是道士，但他仍指责道士和僧侣是剥削者。

基于这种唯食史观，谭峭重释儒家五常与食的关系道："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鸱鸢》）社会治乱的根本问题是"食"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均食"，"能均食者，天下可治。"（《化书·奢僭》）统治者要"俭"，"俭可以为万化之柄"（《化柄》）。统治者如果能俭而与民均食，仁义自在其中，"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太平》）他还通过寓言，赞赏蚂蚁王国君与民无剥削、无压迫、同劳动、同享受的平均主义生活（详见"蝼蚁"章）。统治者做到"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正蒙·太和》）。所谓"太和"，就是"均食"的社会。

在阶级社会里，"均食"根本不可能，"太和"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谭峭为农民着想的善良愿望应该肯定，同样应肯定的是，其理论也从侧面揭示社会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的真实关系。②

（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更为系统且契合唯物史观基本前提的理论建构，是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传统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就。

所谓民生，其内涵孙中山有多处说明："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③"在民生主义里头，第一个问题是吃饭，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穿衣"；④"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也是一种很重的需要，行就是走路"；⑤"故谋国者……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衣食住为生活之根本，走路则且影响至国家经济、社会经济矣。"⑥ 而其民生史观的基本观点包括："历史的重心是民生"，

---

① 类似地，李泽厚认为，唯物史观的通俗解释即为"吃饭哲学"。他说，我们要尖锐地反对斗争哲学，回到"人活着"的物质基础，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吃饭哲学"来对抗"斗争哲学"，反对以各种道德名义将人的生活和心理贫苦化和同质化。李泽厚《课虚无以责有》，《读书》2003 年第 7 期；有关吃饭哲学的话题，亦参见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中华书局，2014，第 204～206 页。

② 高令印、陈其芳《谭峭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福建论坛》1984 年第 4 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 474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 521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 520 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 248 页。

“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①] “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②] 人类求生存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③]

“民生史观”的提出，缘于孙中山深切同情人民群众疾苦，真诚期望从经济上解决民生问题，并以“吃饭穿衣”为社会物质生活的起点。可见，孙中山理解的民生，既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也包括人们对生活、生命的重视。他虽然尚未认识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但仍然富含“唯物史观基因”，具有合理性。他把“民生”作为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完全是中国社会现状给他的启示。当时的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经济匮乏，民生凋敝，而在他看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的途径。[④]

孙中山认为，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从人的感情好恶和道德理想出发，而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他说“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解决得了的，……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⑤] 这种见解完全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他在经济领域提出三项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三是发展实业，引进外资。以此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⑥] 这样“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⑦] 在政治领域他提出独立自主的主张“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得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⑧] 即所谓“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⑨] 这些宏论都表现了孙中山作为近代民主思想家的伟大。

四　结语

总之，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历代先哲留下诸多睿智思想，在社会存在及其作用问题上涌现诸多较为正确的见解，形成了悠久的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经济因素的思想传统，构成今天仍值得我们珍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史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48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48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48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393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479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492～505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10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531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第93页。

观基因”。[①] 这其中，尤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司马迁等史家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和谭峭构建的“唯食史观”，而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提出的“民生史观”，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就。

On the Deep Exploration Conforming to the Basic Premis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SUN Shoutao，ZHOU Defeng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outstanding thoughts，i. e. “the Chinese cultural gen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The thoughts conforms to the basic premise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such as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being and its function，which includes two kinds of profound opinions. One is the attention and study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material life，especially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which includes the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life and the profound exploration on the questions of the economic-life-determines-the moral-status.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atic theroies，such as the Tianqiao’s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latter i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ene; Rela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Profit; Historical View of the Food;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① 孙寿涛、周德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唯物史观基因”》，《人民论坛》2017 年第 16 期。